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编

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

第 1 辑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编

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

第 1 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饶怀民
周秋光

编委会
李育民
莫志斌

郑焱
郑兴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 (第1辑) /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
近现代史研究所编.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1081-623-3

I. 近... II. 湖... III. ①湖南省—地方史—近代—
文集②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①K296.4-53②K250.7-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4444 号

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 (第1辑)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胡晓军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8872636

网址/www.hunnu.edu.cn/press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5.25

◇字数: 453千字

◇版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 7-81081-623-3/K·014

◇定价: 48.00元

前 言

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湖南告别了默默无闻的历史，其伟功盛业令世人瞩目，堪称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深深地印上了湖南的影迹，几乎每一重大事件无法与它割离。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呼，给经世致用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开辟了思想领域的新纪元。湘军的崛起和事功，改变了清王朝的政治格局，为步入近代化的洋务新政疏解了种种梗阻。戊戌维新中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有得风气之先之概，各种举措别开生面，谭嗣同以死“召后起”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孙中山首倡民主革命，湖湘志士呼应最力，实行最力，勋劳卓著，其功甚伟。五四启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湘籍英豪领袖群伦，翻天覆地，为中国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非凡之功绩，立盖世之勋业。谭其骧先生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显然，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命运与共，浑然一体，舍此则无彼。

湖南在近代之崛起，必有其特异之处。钱基博先生在国立师范学院执教时著《近百年湖南学风》，谓：湖南“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

近代是中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激发了湖南人特异的思想和志节，磨砺了湖南人独立不羁的英雄本色，产生了以澄清天下

为己任的豪迈。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有远过于诸省者。”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在近代所表现的这一气概，以及在海内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时人所认同，梁启超推崇湖南为“天下人才之渊藪”，谓：“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林增平先生，在世时非常重视近代湖湘文化暨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的研究，曾筹划成立湖湘文化研究中心，经过努力，今已与其他学科共同建立了湖湘文化研究基地。为践履林先生的遗愿，学科创办这一专刊，拟将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的探讨结合起来，为此提供一个园地，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它旨在阐发有关湖南与中国之近代史事人物之新见，尤冀将两者熔为一炉，解析近代湖湘文化之底蕴，探究其在近代背景下和宏阔境域中的全貌及其发展演变，以及对近代中国历史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钱基博先生言：“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本刊之旨趣，亦在于以湖南为引子，更深入、更透彻地探讨中国近代的历史。

李育民

2006年12月

目 录

湖湘文化与湘籍名人

20 世纪初叶（1901—1949）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概述	周秋光 / 1
再论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饶怀民 / 21
树达先生学术成就述论	范忠程 范 群 / 53
青年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新析	莫志斌 / 72
近代长沙米市初探	钟 声 张建平 / 94

近代政治与外交

近代中日条约关系简论——兼论中国民众对中日条约的态度及其影响	李育民 / 130
陈光甫评议	蒋 慧 郑 焱 / 160
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综述	刘利民 / 182
陆征祥退隐后对救国道路的再探索	尹新华 / 193
省与县：抗战前期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1937—1941）——以浙江为例	尹红群 / 210
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英口岸问题争端	曹 英 / 243

近代思想与文化

- | | |
|------------------------------|-----------|
| 学衡派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 | 郑大华 / 264 |
|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 李长林 / 294 |
| 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 李传斌 / 306 |
| 沦陷区新闻出版业反日斗争述评——以旧中国出版中心上海为例 | 刘苏华 / 348 |
| 从戊戌新旧之争看儒学的困境——以湖南为例 | 张晶萍 / 369 |
| “国粹学派”与史学“科学化” | 朱发建 / 382 |
-

湖湘文化与湘籍名人

20 世纪初叶（1901—1949） 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概述

周秋光

摘 要 从 1901 年到 1949 年，湖湘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作四个阶段：1901 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到 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初步发展阶段；20 世纪的 20 年代，是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动荡发展阶段；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平稳发展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是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发展阶段。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四个阶段中，其发展在物质的、制度的与社会心理的各个层面都有所表现。

关键词 20 世纪 湖湘文化 现代化进程

湖湘文化是长期以来在现今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湖湘文化的“湖”指洞庭湖，湖南在该湖以南；“湘”即湘江，是湖南境内的第一大河。

湖湘文化的现代化起点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具体说是在甲午战争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中，湖南才一反甲午战争前的那种守旧排外的格局，对于西方文化开始受容，并进行了各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模仿和创制。这些模仿和创制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开设学堂，如湖南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二是举办学会，如南学会、湖南不缠足会、长沙延年会；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如

设立保卫局、迁善所；四是创立报刊和建立各项文化设施，如创立《湘学报》、《湘报》，建立藏书楼；五是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如开办矿务局、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制造公司、湘鄂间电线和轮船公司等。所有这些，表现了甲午战争后的湖南，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社会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湖湘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①但是，1898年秋发生于北京的一场政变波及湖南，使刚刚启动的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而停顿下来，直到20世纪初期的清末新政运动中，才又重新起步。

本文对重新起步的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进行探讨，认为从1901年到1949年，湖湘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作四个阶段，下面依次概述：

(一)

从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到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初步发展阶段。这种初步发展在物质的、制度的与社会心理的各个层面都有所表现。

物质文化层面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湖南的近代工业在维新运动时期尚规模较小，影响甚微。截至1902年，其官办、商办的厂矿总数只有78家，投资总额不过274.9万元，只稍多于南通状元张謇一人在1903年所拥有的资本量。而且这些厂矿中还是官办企业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岳阳、长沙等地相继开埠，帝国主义的经济触角伸到了湖南，外企的创办与洋货的倾销加速了湖南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其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实业救国的思潮席卷了三湘大地。湖南的有识之士纷纷投资办厂，希望通过此举来达到抵制外货、与洋商争利，进而救中国与救湖南的目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湖南的近代工业便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统计，从1903年到1911年，湖南共创办路、矿、工、航企业104家，投资总额达到1707.4万元，而且大部分都是商办企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湖南矿务总公司（1903年）、醴陵瓷业制造公司（1906年）、华昌炼锑公司（1908年）、湖南电灯公司（1911年）等。

与沿海省份相比较，湖南的近代工业的发展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路、矿成为主要的投资领域。沿海省份的近代工业在19世纪60—70年代兴起。那时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侵略还是以商品输出为主，中国的商品市场尚在拓展之中，因此，沿海省份的投资者们可以通过创办轻工业与仿造船来品来与洋

^① 周秋光：论湖湘文化的近代化开端及其标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5）

商争利。但湖南近代工业的起步是在 19 世纪末,比沿海省份晚了近三十年。此时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已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为主,尤其对中国内地矿山的开采与铁路的修筑垂涎欲滴。故湖南的投资者们在选择投资的领域和去向时不仅仅是从经济利益上考量,更重要的是从政治权益上考量。即把维护民族的利益和主权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千方百计地要使矿山的开采与铁路的修筑之权不落外人之手。二是湖南能够作为原始资本的货币积累十分短绌。这是因为湖南地处内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在全省占主导地位。据统计,1903 年,全国共进口 1656186 公担棉纱,湖南只进口 13304 公担;全国进口棉布的价值为 92783041 元,而湖南只有 1430567 元。^①这种低水平的商品经济使得湖南一般的绅商难以积累起巨额的货币财富,自然也无从产生像沿海省份那样的拥有相当数量资金的买办集团。当时湖南大多数的绅商有了钱都只“求田问宅”,热衷于封建地租剥削,很少有愿意投资于近代实业而承担风险的。这样一来,湖南近代工业发展的融资渠道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

由上可见,湖南近代工业在清末虽然有了发展,但是不尽如人意。直到民国建立之后,其发展的步伐才有所加快。

民国初年湖南近代工业快速发展的动因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湖南特有的可充作军火原料的锑、铅、锌等矿砂竞相购买,使得这些矿砂价格猛涨,从而刺激了湖南的投资者们对于这些矿产的迅速开采。故民国初年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实际上主要是采矿业等部门的发展。如当时新化锡矿山一带采矿公司林立,工人由过去的 3~4 万人骤增至 10 万人,锑矿砂在 1914 年的年产量高达 81 万吨。又如官办水口山铅锌矿,其采矿工人也由原来的 2300 人增加到 5000~6000 人,矿砂的年产量在 1916 年高达 3.7 万多吨。全省采矿的厂家,截至 1916 年已高达 8000 家以上。1912 年,湖南矿产品出口值仅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3%,而 1916 年竟高达 58.1%,创历史以来最高纪录。^②并且采矿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与此相联系的冶炼业的发展。仅新化锡矿山先后设立的采锑公司就有 100 余家,炼锑厂达 30 余家。炼矿公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以华昌炼锑公司为例,1908 年开办后的 7 年内,各年互有盈亏。但欧战发生后,面貌为之一新。1915 年即扩充商股达 96 万两,次年加招商股 204 万两。且在益阳、安化、新化等地增设分厂,1914—1917 年间工人人数高达 2 万以上。其生产数量 1914 年产纯锑 1888 吨,1917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81;刘世超.湖南之海关(第2章).长沙:湖南经济调查所,1934

② 林增平,范忠程主编.湖南近现代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82~383

年增至 8200 吨。^① 又如湖南黑铅炼厂, 1918 年 5 月开炼以来, 炉座容量每日可炼矿 50 吨。^② 矿业, 可以说成了湖南近代工业的重要支柱。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湖南的矿业是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机遇才得以发展的, 战争结束, 铅、锌、锑等矿产的需求量减少, 价格降低, 出口额大幅度回落, 于是湖南的矿业便由“繁荣”而转入衰败。据载, 新化锡矿山的锑砂, 因欧战结束后锑价惨跌 (纯锑每吨只在 90 元以内), 采锑公司与冶炼锑厂十分之七八均行倒闭。如前文所提到的在欧战期间获利甚巨的华昌炼锑公司, 欧战后损失资本达 100 万元。^③ 到 1919 年 9 月, 公司股东扬度、周扶九等不得不向上海银行借款 100 万元维持, 并将该公司在美国设立的推销代办处取消, 出口美国锑砂, 改委中美贸易公司代销, 并接纳该贸易公司投资 50 万银两, 以出口锑砂作价抵缴, 始得每年脱售纯锑 1 万吨, 暂时维持残局。^④

与矿业相比, 湖南轻工业的发展相形见绌, 不仅企业的数量少, 而且规模也小。民国初年湖南创立的比较有影响的轻工企业有麓山玻璃公司、湖南第一纱厂 (后更名为第一纺织厂)、湖南面粉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在南北军阀在湘混战期间艰难挣扎, 唯有官办的湖南造币厂因有政府支持, 发展状况稍好。湖南的轻工业与矿业之间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落差, 究其原因有四: 一是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打击; 二是本省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 自然经济尚占据主导地位; 三是欧战时经营矿业获利丰厚, 使得资金大量流向有色金属的开采与冶炼; 四是军阀混战于湖南, 政局动荡, 缺乏发展轻工企业的外部环境。

制度文化层面近代湖湘文化初步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新式教育的推行与军事体制的改革。在新式教育的推行上, 湖南借清末新政的东风, 以 1902 年 6 月由巡抚俞廉三在奉命在省城设立的学务处 (此为湖南省最早的新式教育行政机构) 为契机, 次第开始了各类各级新式教育的兴办。

首先是高等教育的兴办。按照清廷 1902 年 4 月颁发的上谕, 各省城均应设立大学堂。本来湖南应当将久负盛名的岳麓书院改为大学堂, 可是因为岳麓书院的山长王先谦等人极力反对, 巡抚俞廉三遂将求实书院改了完事。求实书院是由原时务学堂改名而来的, 它实际上只有中学的底子和规模。改了

① 林增平, 范忠程主编. 湖南近现代史.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383

② 刘泱泱. 近代湖南社会变迁.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232

③ 李会刚. 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135

④ 李会刚. 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136

一年多后,仍无法教授专门的大学课程。这样自然招来多方的责备。俞廉三迫于舆论压力,于是将新改的大学堂降格为高等学堂。但降格后,由于这里设备简陋,教室宿舍狭小拥挤,难容多人,与高等学堂的称号仍不相符。而隔河相望的岳麓书院校舍宽敞明亮,学生却在那里吟风弄月,仍从事旧式的书院教育,两相比较,情理难容。为此,1903 年新任巡抚赵尔巽便不顾王先谦等保守派的反对,强行将高等学堂迁入岳麓书院。同时在高等学堂的原址(即求实书院)开办湖南高等农工商矿实业学堂。但该学堂开办后实际只设矿种,后来发展,改为高等工业专门学校。^① 湖南在办实业学堂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所医学堂。1903 年俞廉三奏折中称:“中国医学最精,以向来未立学科,渐致失传,以拟于省城设立医学堂一所,暂行招考学生二十名,延聘教习,布设各项讲堂、体操场,先行开办。”^② 除此之外,1906 年,巡抚庞鸿书还创办了湖南法政学堂。1910 年该学堂改名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在湖南办有高等教育,如湖滨大学堂(岳阳)、雅礼大学堂(长沙)等。

其次是中、小学教育的兴办。按照清廷上谕,中学一般设于府或州的所在地,称作官立中学堂。湖南在 20 世纪初有 9 府 4 州,按理说至少应设 13 所中学。但是直到 1905 年,才由巡抚端方建立起中、西、南三路公立学堂 3 所:中路在长沙,西路在常德,南路在衡阳。1908 年,长沙与衡州二府又分别设立公立中学堂各一所。除公立中学堂,省内还有不少私立中学堂。最早的一所私立中学是 1903 年 3 月由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胡元倬约龙璋、龙绂瑞、谭延闿等人共同创办的明德学堂。此后有彭国钧、狄昂人于 1904 年创办的修业中学,朱剑凡于 1905 年创办的周南女校,禹之谟于 1906 年创办的惟一学堂(后改名广益中学),陈润霖于 1906 年创办的楚怡学堂等。上述中学都在长沙。当时湖南还有分路设立公学的提议,于是李执中、林支宇等人于 1905 年在沅江设立了湖南西路公学,此为私立兑泽中学的前身;刘光前、何炳麟等人于 1909 年在衡阳设立了湖南南路公学,此为私立岳云中学的前身;谭延闿、马邻翼、方克刚等人于 1910 年在长沙设立了湖南中路公学,此为妙高峰中学的前身。此外,还有部分美国教会创办的中学,计有 1903 年创办的贞信女校,1905 年创办的朝阳中学,1906 年创办的信义中学,1907 年创办的贞德

①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见:湖南省志·教育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② 俞廉三遗集(卷九十五)。[出版者不详]

女子中学, 1908 年创办的雅礼中学、成章中学, 1910 年创办的艺澜中学等等。^① 据统计, 1907 年, 湖南的普通中学堂为 39 所。到 1909 年, 已达 47 所, 在全国排名第二, 仅次于四川。

与中学教育相比, 湖南的小学教育就大为逊色了。这是因为当时办学维艰, 人才匮乏。人们普遍认为, 先将旧式书院培育出来的士人进行改造, 让他们从中学以上的学堂毕业出来, 再去推广和普及小学教育, 因此, 小学教育最初是受到冷落的。到 1905 年端方抚湘, 感到这样下去不行, 于是加紧设立小学。就在 1905 年的半年之内, 全省增设小学堂 83 所, 强制 5~10 岁的儿童入学, 如有不入学的, 便罚其父母。到 1909 年, 湖南已有初、高等小学堂共 1113 所, 学生 43310 人。^② 但当时湖南全省有学龄儿童近 300 万, 入学率尚只有 1.5%, 可见基础教育的进展步伐还十分缓慢。

再次是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的兴办。各地新式教育兴起后, 为了解决师资紧缺的问题, 1903 年, 俞廉三在长沙黄泥街办起了一个师范馆, 委王先谦充监督。算术、理化科目均聘日本教员, 教科书大部分由日本引进译成中文。入师范馆就读的多为前一年乡试落第的生员。第一批招收 140 人, 在校学习一年, 便放他们到全省各地担任教师, 待服务一段时间再回来完成四年制的学业。1904 年赵尔巽抚湘, 见省城师范馆办起后仍无法解决全省急如星火的师资问题, 乃指令全省各地都设立师范传习所, 以学一年为期, 自行解决本地师资。稍后, 分路办学议起, 赵尔巽乃将省城师范馆改为中路师范学堂, 招收长沙、宝庆、岳州等府属各县的高才生, 另于常德设立西路师范学堂, 招收常德、澧州、辰州、沅州、永顺、靖州等府属各县的高才生, 于衡阳设立南路师范学堂, 招收衡州、永州、郴州、桂阳等府属各县的高才生。到了 1907 年, 湘抚岑春蓂根据学部关于设立二年制优级师范的指令, 派提学使吴庆坻将省城贡院改建成一所优级师范学堂, 算是省立的, 于 1908 年开学。

湖南的职业教育是伴随实业救国的思潮而在省内兴起的。最早的一所职业学校是王先谦等人于 1902 年设立的农务工艺学堂。^③ 端方抚湘后于 1905 年将该校的农、工分开, 设立农业、艺徒两学堂。1904 年湖南办起了一所高中

① 据统计, 当时湖南有教会中学堂 17 所。参见: 论外人在湘省之设学状况, 教育杂志, 1912 (12)

② 张朋园,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 台北: (台湾) 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1983, 173

③ 湖南教育志(原始资料手抄本), 长沙: 湖南省教育厅史志办

程度的实业学堂,后改为路矿学堂。1902 和 1907 年,又先后办起了一所瓷业学堂和一所中医学堂。1911 年,经龙璋、谭延闿倡议,还设立了工业、商业学堂各一所。

湖南的新式女子教育创始于 1903 年。是年龙璋创办了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以“修明妇德、洞达物情”为宗旨,对女子进行道德、家庭与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此后,湖南陆续出现的女子学堂有淑慎女学、影珠女学、湖南西路女学、周南女学、女子美术学校、实业女校、常德女子师范等。^①

湖南新式教育的推行除了上述各类各级学堂的兴办,还表现为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即到国外去学习师范和各种有用的知识,来补充省内教育的不足。1902 年,俞廉三考选了 11 个举贡生员出身的青年到日本学习 6 个月的速成师范。1903 年再度派出 24 人赴日本学习理、工、法诸科,4 年学成回国。除公费留学生外,私费留学的也不少。据统计,1904 年,湖南公费、私费留学日本的人数达到 800 人,占全国留日总人数的 1/4。到民国初年,湖南留学的热潮仍未消退。除留学日本外,到 1918 年,湖南学子中又出现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与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等组织。1919、1920 两年中,湖南留法学子高达 300 余人,占全国留法学生总数的 1/5。

在军事体制的改革上,从 1902 年开始,湖南抚院遵旨对旧式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时编练新军。改造旧式军队的办法一方面是对绿营大幅度地裁减,除保留镇筴、绥靖两镇,乾州、永州两协 and 河溪、镇溪、保靖、古丈坪 4 营外,其余湖南所有的绿营均限于 1919 年前全部裁减;另一方面是将湖南所有的巡防营进行重新编制,按照西法操练,并增购精良武器等。

在改造旧军队的同时,湖南还另行编练新式军队。编练新式军队也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开办军事学堂,培养新式军官。1903 年 5 月,湖南武备学堂开学。同年 11 月,武备学堂附设将弁、兵目、陆军速成学堂。1905 年端方奉旨宣布武备学堂学生提前结业,学堂停办。同时在原武备学堂原址另设湖南陆军小学堂。该学堂引进新式教学方法,为湖南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对促进湖南的军事近代化贡献甚多。另一方面是组建新式军队。1904 年,巡抚赵尔巽编练新军一标和炮兵一队。1905 年,端方将其扩充为步兵两标和炮兵一营。1909 年,巡抚岑春蓂正式成立湖南新军,将第一协暂编为陆军第 25 混成协,所辖第 1、2 标分别改称为第 49 标和第 50 标,另有炮兵、工程、骑兵、辎重各营。另外,端方还于 1905 年遵旨 in 长沙设立督练公所,统一领导

^① 湖南省志·教育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全省新军的编练工作。新军与绿营、巡防营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所任军官大都是新式学堂出身，受过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军事水平较高，思想也较开明；二是新军士兵训练比较严格，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驻扎省城，易于接受新思潮的影响；三是在待遇上，新军比旧式军队优厚。清末新军的创建，标志着湖南的军事脱离了传统的形态，开始向着近代化的路径迈进。而且，湖南的新军在辛亥革命中成为创建共和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会心理文化层面近代湖湘文化初步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各种新思潮的流布、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社会习俗的嬗变。20 世纪初期，众多的湘籍留日学生纷纷提出各种社会思想政治主张，然后汇集成潮，再通过新式的报刊传遍三湘大地，给湖南的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清末湘籍留日学生中比较重要的思潮包括反帝爱国思潮、排满革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军国民主义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等。这些思潮尽管具体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都要求革故鼎新、振刷国运，希冀国富民强。在倡导这些思潮的仁人志士中，代表性的人物有陈天华、杨毓麟、杨度、熊希龄、宋教仁、秦力山、宁调元、谭人凤、焦达峰、蔡锷、黄兴、章士钊、禹之谟等。传播新思潮的报刊在省内的有《湖南官报》、《长沙日报》、《湖南白话报》、《湖南演说通俗报》，在省外的有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游学译编》、《二十世纪之支那》、《洞庭波》等。传播这些思潮的有影响的著作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杨毓麟的《新湖南》，蔡锷的《军国民篇》，章士钊的《杂书》等。^①到了民国初年，大部分革命党人都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达到，今后的任务是建设国家、改良社会，使中国稳步走向繁荣。当此情势下，湖南省境内时兴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与政党政治诸种主张，或从经济文化方面入手，推广教育，振兴实业，或从改良政治入手，致力于研究和效仿西方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实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其中，黄兴与宋教仁成了宣传和鼓吹这种思潮的主将。

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与国内的其他省区比较，起步较晚。当 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京、沪等地迎风飘扬的时候，湖南尚沉寂一片，尊孔复古的思潮在这里大为流行。直到四年以后，湖南才一改往昔沉闷的气氛，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其时，鼓吹和宣传新文化的报刊，除了早在 1915 年就已创刊的湖南《大公报》外，新增加的在各地如

^① 湖南省志·新闻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28

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教育》、《湖南学生杂志》、《女界钟》、《体育周报》、《岳麓周刊》、《明德周刊》、《工学周刊》、《长郡周刊》、《长沙周刊》、《宁乡旬刊》等。^① 这些刊物以宣传新思潮、改良社会、提倡国货、唤起爱国精神和批判旧的制度与道德为主旨，言论不涉及政治，因之一时在湖南思想文化界狂飙突起，蔚为壮观，影响及于全国。

除办报刊，组织社团也是推动湖南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手段。1918年4月，长沙出现了第一个提倡文化革新的团体——新民学会。创办者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该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进而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② 次年6月，朱剑凡、徐特立、杨树达、向绍轩、何炳麟等人集中湖南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学术性团体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介绍西方的平民教育与各种社会政治学说。^③ 同年12月，向警予、蔡畅等倡导女子结伴赴法勤工俭学，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要求会员随时提出关于女子的问题，互相研究和宣传。^④ 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励进会，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该社对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书刊中所描述的美妙前景发生兴趣，引为奋斗目标。1920年8月，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方维夏、姜济寰、易培基等人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该会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尤注重了解十月革命与苏俄政权建设的状况，以澄清国内反动人士对于俄国革命的歪曲宣传。与此同时，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又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该社主要是以最迅速和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和经销全国各地最新出版的书籍杂志，以充当青年与全体湖南人了解和研究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材料。^⑤

随着湖南新文化运动不断地向着纵深发展，各种新思想和新观念便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诸如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奴隶根性；提倡妇女解放，批判封建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平民教育、地方自治、工读互助……并且马克思主义也在湖南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所有这些，活跃了湖南思想文化界，促成了湖南继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又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运动。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湖南的社会习俗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清

① 湖南省志·新闻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② 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

③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02-21

④ 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大公报（湖南），1919-12-03

⑤ 大公报（湖南），1920-07-31

末民初，湖南境内以四世同堂为特征的复式家庭和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要内容的包办婚姻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不再四世、三世同堂的现代新家庭的数量逐渐增多，自由婚恋与文明婚礼也逐步得到社会承认。由传教士、使领人员和湖南留学生、出使人员带入湖南的西方食品和饮食习俗由省会向中小城镇扩展。西方菜肴、罐头成为新派官绅的常用食品，餐馆酒楼开设西餐者亦日渐增多。妇女已不再缠足，除小部分保守落后的家庭，女子放足成为普遍现象。并且妇女已敢于剪发烫发，汉族妇女也较为普遍地穿上旗袍。西装革履备受公职和上层人士的青睐。学生装、中山装广为流行。市场上西洋商品越来越多。舞会、扑克、桌球、电影等西方娱乐方式渐次为湖南的上流社会接受。社交场合取消了磕头跪拜礼，代之以鞠躬与握手的方式。称呼上也多不叫“老爷”与“大人”，而以“先生”、“女士”或某种职衔相称。这些社会习俗的嬗变凸显出人们对于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体现人格平等的价值观的追求。所有这些，是近代湖湘文化在其核心层面——社会心理层面的发展与变迁中最为突出的表现。

(二)

大革命前后，即20世纪的20年代，是湖湘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动荡发展阶段。其时，湖南封建与半封建农业经济仍占居显著地位。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加大了对湖南的经济掠夺。这些方式包括：其一，利用不平等条约，重新控制湖南海关，进行直接掠夺；其二，通过索取赔款和贷款，控制关税和盐税的支配权，垄断了湖南的财政；其三，开设银行，操纵了湖南的金融；其四，开设洋行，控制了湖南的商品市场；其五，开设轮船代办行等机构，垄断了湖南的航运；其六，开办矿厂，垄断了矿砂的销售。

湖南的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处在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环境，其发展日见艰难。矿业，如前所述，已由欧战时的畸形发展走向急剧衰落。轻纺工业和商业也从昔日的繁荣滑向了一蹶不振的低谷。仅有交通、邮电等少数行业，在时兴时辍中略有进展。如长潭公路，1913年动工修建，到1921年11月已全线竣工通车。粤汉铁路长株段，于1912年开始勘测，历时7载，到1918年9月也全线通车，全长480余公里。邮政，全省在1913年只有34个局所，到1921年已增至70多个，邮程3.6万公里。全省的电报局，也由1913年在23个县设局，增加到1916年在40个县设局。湖南民族工业由盛转衰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湖南经济半殖民地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也表明湖南民族工商业自身的基础和力量还十分脆弱。